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 临床通用卷

• 儒门事亲  
• 丹溪心法



中华中医药学会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华中医药学会／编 主编／李俊德 高文柱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

# 临床通用卷

· 儒门事亲

· 丹溪心法

本册主编／焦振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临床通用卷/焦振廉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080-4247-3

I. 中… II. 焦… III. ①中国医药学—古籍—汇编②中医学临床—古籍—汇编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30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20.5 印张 543 千字 插页1

2007年6月北京第1版 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编委会

顾问 邓铁涛 路志正 马继兴 张灿理  
主任 王国强 余靖  
执行主任 房书亭

主编 李俊德 高文柱  
副主编 张伟 曹正逵 温长路  
编委 王均宁 王奕 王振国 牛兵占  
牛淑平 田代华 田思胜 朱桂  
伊广谦 庄乾竹 刘平 刘山永  
刘更生 刘掌印 孙永章 孙中堂  
纪立金 许敬生 严季澜 吴启富  
沈澍农 张效霞 张瑞贤 张子明  
和中浚 祝庆俊 欧阳兵 胡晓峰  
郭君双 黄龙祥 常章富 蒋力生  
董尚朴 焦振廉

(以上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下名士游”，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读书与实践，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宝。历代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这些名著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也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博览群书，精研覃思，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

纵观古往今来的名医巨匠，无不是通过熟谙典籍、躬身实践而登上中医药学术高峰的。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是在书的催化中，锤炼为万代永传之宗师的；药圣李时珍“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家”，是在书的滋养中，磨砺为千秋不朽之巨匠的。可以说，凡有成就的名医和学者，尽管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不同，或家传，或师承，或自学，但“学经典，读名著”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已经证明，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不读书，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无继承，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

经典著作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更是临床家的活水源头。诚如徐灵胎所言：“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历代名医都把读熟、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行医的一项基本功。已故名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对《金匱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即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以得心应手。”“学医必须读书”，早已成为医家之共识。

实践告诉我们，中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读书、临证、师承这三大要素。读书是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学的重要源泉。临证是体验中医、运用中医学知识实现防病治病的基本途径。师承是按照中医学自身规律传承和发展中医学的学科特色。这三大要素，互相关联，各有侧重，不可偏废。但三者之中，读书是最基本的路径。只有多读书，才能加深对中医药学的认识，才能增强对其内涵的领会，才能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如果读书太少，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临证则辨证不精、用方不活，仅能知常，而难达变，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

有鉴于此，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华夏出版社的密切配合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起“学经典，读名著”的大型读书活动，旨在培养、发现并推出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会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开展，希望全国中医药行业共同关注医学名著的阅

读,分享阅读的收获和快乐。

中医典籍,浩如烟海。学会为了组织这次读书活动,按照名老中医推荐、参编人员精选、有关专家把关、藏书部门和出版社提供服务的原则和程序,从历代流传广、社会影响大、临床实用价值高的古医籍善本中确定百部左右,编成这套《中医必读百部名著》丛书。考虑到读者阅读方便,尽量采取合并同类、合理集成的形式,把百种古籍分为医经、伤寒、金匱、温病、方剂、本草、诊法、针灸、推拿按摩、养生、医案、医论医话、通用临床及临床各科若干个类别,部帙较大的图书,则单独成册。每书均采取书前写导读,随文做注释,分章(节)加按语的体例,帮助读者尽快了解内容、掌握重点,并解决阅读上的困难。导读主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影响、本次校注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其中重点内容是古籍的学术价值及影响,特别是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指导作用;还刻意引证了古今名医对该书的评价,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把读者带进书中来。对原文的整理以点校为主,注释简明扼要,减少过多过繁的考证。按语则紧扣各书的内容,以自然章节、门类为单位,通过简洁的文字表述,把学术亮点突出出来,对读者真正起到辅导作用。从整体水平上看,这次出版的每类书籍既是该领域历代医籍的精萃,又是该学科学术构成的主流,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永久的收藏价值。

中医之计人为本,人才之计书在先。希望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根据本丛书所收书目,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制定自己的读书计划,在读书过程中汲取历代医学之精华,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为振兴祖国中医药学而努力提高每一个中医药工作者的学术素养。

“书到用时方恨少”。让《中医必读百部名著》陪伴我们的一生,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让读书成为指导和提高中医药实践能力的源泉!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刘纯

2007年4月23日

# 儒门事亲

金·张从正 著

焦振廉 校注  
温长路







## 导 读

张子和是我国金元时期著名的医家之一,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被后世共称为“金元四大家”。《儒门事亲》是张子和学术思想的提炼和总结,由它所记录和反映的“攻邪”学说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故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效法和发挥,研究者代不乏人,对中医医学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且远及日本、朝鲜等国家。

在复兴中医、创新知识的今天,有必要对张子和及其《儒门事亲》研究的情况进行一下梳理和反思,以期对他的研究工作能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

### 一、张子和其人

张子和,名从正,字子和,因其祖居地属春秋时期的戴国,故自号“戴人”。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即金贞元四年),张子和出生于睢州考城,时值宋金对峙,社会动荡,幼年时期的他即已经目睹和饱尝了“天下多故之时,师旅数兴,饥馑相继”的痛苦。他自幼从父学医,20多岁悬壶济世。“为人放诞,无威仪,颇喜读书作诗,嗜酒”(《归潜志》)。50岁左右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60岁左右曾被召入太医院,不久即归。其后便在豫东一带行医带徒,交游访道,研究著述,撰成《儒门事亲》一书。宋理宗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即金正大五年)秋冬之际卒于寓所,享年72岁。

关于张子和的祖籍,历来多有争议,有兰考、民权、淮阳诸说。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民权说。另有折中的说法,认为是在民权县与兰考县之间(邓铁涛等.《儒门事亲》.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河南开封学者刘学勤根据史料记载的考证比较详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判断。

张子和的祖居地“考城,古之葵丘也”(1941年编《考城县志》)。葵丘是齐桓公与诸侯的会盟之地,因与考城相近,故称考城为“古之葵丘”。今民权县地图在林七乡西南约三里处,标有“葵丘会盟台”五字,此处当是古代考城的旧址。民权县始组建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经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批准,将考城、睢县、杞县部分辖地划出设立民权县,县治李坝集(今老城)。考城县自汉至元初没有变动,自元至明虽经三次黄河泛滥,县治屡经迁徙(三桥集、李堂乡、北关集),均在今民权县境内。至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考城知县雷逊在埵阳筑新城,考城县治方设于今兰考县境内,与金代睢州考城县治有40公里之多。所以,张氏故里应在河南省民权县。

(刘学勤.《吐下汗奇方妙法治百病》.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

淮阳,即古陈州、宛丘,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对同一地区的不同称谓,实二名一地也。史料有张子和“久居陈”(《归潜志》)的记载,含有侨居而非原籍的意思。《儒门事亲》中亦有其“侨居濉东”的说法,而“濉”即“濉水”,即今之沙河,流经淮阳境内。可见此地是张子和的侨居地和主要的行医地域,而并非其故里。

张子和从军的历史源于他的自述。《儒门事亲》卷二中有“余向日从军于江淮之上。一舟子病,予诊之,乃五实也”语,有学者据此认为他年轻时曾有从军经历。萧国钢氏经过考证后认为其从军属实,但当时在50岁时,其身份亦非普通士卒,而是随军医生。结合当时宋金间战事,萧氏的说

法比较可信。

1156~1228年间(张子和在世之年),宋金大兴军旅战于“江淮之上”有两次。首战时,值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侵,遭南宋军民殊死抵抗,金军侵临采石未渡,复折扬州,后因国内有变而北归。子和年仅五岁,不可能从军……第二次史称“开禧用兵”,时值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趁金世宗已崩,章宗新继,金北部部落叛乱,财匮国衰之机,以图恢复北土而用兵。金朝“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万人入淮,十万入荆襄”(《大金国志》卷二十一)。金兵渡淮,攻六合,破真州(今仪征),逼江岸。宋师不利,三月后以南宋输币议和告终。此时子和年50岁。子和曾云:“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儒门事亲》卷一),当指此役。以五十之龄从军似匪夷所思,然元人刘祁说“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强壮,或尽取无遗”(《金史》卷四)。张氏从军,并非执戈冲阵,从他为舟子治病来看,只是履随军医生之职。故50岁亦可被签征,过了二三个月的短暂军旅生活。

(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关于张子和被召入太医院一事,肯定是事实。张子和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用“耽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旧游马上行人老,不是当年过汝南”的诗句表达过这段经历的得意、失落的复杂感情,《儒门事亲》中亦有他与太医接触的实录。不过,这段经历很短,《归潜志》和《河南通志》中“旋告去”、“居无何辞去”的话可证。至于来去之因,至今仍是个谜。不少学者推断,张子和被召是因医术出名,“起疾救死多奇效”,且家居京城不远故,而辞归则可能与其为人刚直不阿,不屑卑躬屈膝以及学术见解不合时宜有关(邓铁涛等.《儒门事亲》.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张子和晚年行医及活动的范围,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及《儒门事亲》中涉及的病案推测,有学者认为是在以其侨居地为中心的北自开封、南到息县、东至舞钢、西及亳州的这个地域之内的(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的行医范围应包括东至山东,西达洛阳,南及长江,北到河北的更广泛地域(张国泰等.对张子和医疗活动范围的再探讨.中医研究,2001,14(5):7)。张子和行医民间,服务百姓,活人无算,声名远播,且勤勉不倦,直到谢世之年仍有察疾问病的记录。《儒门事亲》正是这一期间酝酿成形,后在其友人、门人和弟子们的协助下日臻完善,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张子和热爱医学,既是继承的典范,“专探历圣之心,阐发千载之秘”(《中国医籍考》),更是创新的楷模,不惧“谤言满市”,大胆探索,独树一帜。这种超俗改故、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当时是非常不易和可贵的。他一生的作为和成就,是建立在“夫医贵有才,若无才,何足应变无穷”的世界观和“识练日久,至精至熟”的修炼方法上的,是其独立人格和医德精神的真实写照。金人李夷的《赠国医张子和》诗写得极好:“禁御喧喧以字行,粗工往往笑狂生。天将借手开金匱,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鯖。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诗中把张子和列为上工,比为华佗,把他的学说赞为金匱,奉为经典,是毫不过誉的。

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精华,是他创立的以汗、吐、下三法为核心的包括病理、病因、治疗、康复等内容在内的全新医学理念,今天理解起来似乎并无太大异议。但在长期以温补为用为上、为世人偏爱的认识论和传统习俗主导下的当时,认为其说过于孟浪,有违“中庸之道”的看法也不为怪。中医的立论基础是“执中致和”,把阴阳平衡的生理状态视为“适中”,把阴阳失衡的病理状态称为“失中”,把平衡阴阳的治疗过程叫做“执中”(温长路.从《黄帝内经》中的执中思想看祖国医学的立论基础.医学与哲学,1993,(11):33)。执中的手段是求和,“和”既是中国哲学的理论核心,自然也是



中医理论的核心,和平、和谐、调和、中和、协和、平和等,皆是要“和”(澳门中国哲学会:《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思考》,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攻邪学说有动作之指、激烈之嫌,与“和”岂不相左?如不仔细琢磨,此说似乎可信,若透过表层一看,其实非也。中医学的升降出入、生克承制是一套完整的综合机制,攻邪与扶正作为这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黄帝内经》中早就说得明白:“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大论》)也就是说,攻邪是包含在“和”的范畴之内的。有人把邪的存在、性质分为三种性状,并据此提出三套应对的祛邪方案来,把它与“和”的关系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张流秀. 还正祛邪论内涵浅识. 中医药学刊,2004,22(12):2335):

|      |   |            |   |          |
|------|---|------------|---|----------|
| 邪的存在 | { | 势盛→肆虐横行←抗邪 | } | 祛邪方法(治疗) |
|      |   | 质坚→坚顽难化←化邪 |   |          |
|      |   | 蓄留→不往体外←排邪 |   |          |

对于肆虐横行之邪采取抗邪之法,即是与病邪的抗争,属于对峙战;对于坚顽难化之邪采用化邪之法,可以理解为对邪的改造,属于持久战;对于不往体外之邪施以排邪之举,就是把邪驱逐出国门,属于速决战。“人之受病,如寇入国,不先逐寇而先抚循,适足以养寇而扰黎民也。”(《医旨绪余》)邪的表现不同,治疗手段和方法亦不同,体现的正是中医辨证施治的基本法则,有何怪哉?三者之中,后者虽然显得激烈一些,但使用的仍然不是将邪灭除的极端手段,只是驱邪外出,给邪以出路罢了,使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吕氏春秋·异用》),网开一面,用的是仁人之道,怎能把它理解为离经叛道呢?“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可见张氏倡导的攻邪思想并不是要除邪于体内,用汗法以“开玄府而逐邪气”,用吐法以“令其条达”,用下法以“推陈致新”,汗、吐、下三法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没有偏离和超越中医哲学关于“和”的概念界定。把它理解为背离中医精神,是对中医学缺乏全面理解的表现,是对张子和学术的曲解。由此我们联想到对中医特色、优势的界定问题,其前提是不能背离中医“执中”的立论基础和“致和”的哲学要素的。现代一些研究过分把中药杀菌灭毒的作用视为砒码宣扬,并作为普遍法则在疾病治疗中推广,殊不知它既不是治疗疾病的唯一手段,也不是中医实现理想疗效的主要手段,更不是实现先进的综合医学模式的全部手段。说千道万,中医的要害还是在那个“和”字上,对它的继续和创新不能背离这个根本。

张子和的创新精神和学术思想,是矗立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永远的丰碑,是优秀中医药文化中光辉灿烂和值得自豪的一页。作为攻邪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张子和的学术地位是无疑的和确定的。他的学术中既有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学精华的滥觞,也有他个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学整体内容中的重要构件和宝贵财富,其影响将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承和深入发展而日渐显现并得以加强。

## 二、《儒门事亲》的主要学术成就

《儒门事亲》是张子和学术思想的主要蓝本。作者以为“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以“儒门事亲”为名。全书十五卷,约20余万言。关于其成书时间,有学者认为在金·卫绍王大安二年至金哀宗正大五年之间,即公元1210~1228年之间(姜春华. 张子和考.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5,(2):17)。也有学者认为应在其50~70岁的20年间,且非一气呵成,乃由其自撰部分和门人、弟子整理部分结合而成的(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对全书文字内容和行文风格的考察,后者的说法比较确切。

《儒门事亲》十五卷通行本的卷一至卷三载医论 30 篇,题为“儒门事亲”,张子和力倡的汗、吐、下法及攻邪理论在此得到充分表述与阐发,基本出自张子和之手,即所谓“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金·张颐斋《儒门事亲》引),部分内容和文字经过其门人麻知几的修改和润色。

卷四和卷五题为“治病百法”,辑录内、外、妇、儿、五官、皮肤诸病证治经验 100 条,分类罗列,以例论证,病因病机从略,治法方药尤详。汗、吐、下三法之外,亦有对针灸、按摩、导引、心理、食疗等法的综合应用,是张子和力主攻邪、兼顾调补学术思想的充分展示。

卷六、卷七、卷八三卷题为“十形三疗”。十形者,风、寒、暑、湿、燥、火加内伤、外伤、内积、外积;三疗者,即汗、吐、下三法。三卷共收录病证 139 种,病案 162 例,是张子和平生特别是晚年医疗经验的汇集。从文字气象看,其内容大部分为其门人整理而成,其中也不乏他们个人的传承、理解与发挥的心得。医案言简意赅,表达清晰,语言生动,记录翔实,表现了张子和精于医道、善用攻邪、圆活诸法的大家风范。

卷九题为“杂门九记”,体裁为医话,应是其门人整理的跟师笔记和学习心得的合录。其内容广泛,表达灵活,语言通俗,形式活泼,是应用这一体裁表现医家学术经验的较早作品之一,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和启迪作用。

卷十题为“撮要图”,是以图表形式表述中医基础知识的启蒙教材,上自《黄帝内经》,下至个人心得,内容详备,条理清晰,直观明了,易懂易记,应是张子和早期所作,除传播学术外,也反映了其治学课徒的严谨精神。

卷十一题为“治法杂论”,体裁与“治病百法”类似,系以风、寒、火、内外伤为主题的医学专论,共 15 门。与“治病百法”多有重复,但文字相对古朴,内容也较庞杂,似是张子和早期的讲稿或笔记,而“治病百法”则极有可能是张子和门人在其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门事亲》成书时间上的交错性和撰写(整理)人风格的差异。

卷十二题为“三法六门”。三法谓汗、吐、下三法,六门谓风、寒、暑、湿、燥、火六邪。附内外兼治、调治之方,共载方 171 首,从方药层面反映了张子和以攻邪气为理,以汗、吐、下为法的学术特点,是张子和学说在临床应用上的代表作,适应于相关疾病的治疗。

卷十三题为“刘河间先生三消论”。《三消论》为刘完素未刊遗著,经张子和门人麻知几编辑后收入。“因在前此书未传于世,恐为沉没,故刊而行之”。该书载述了刘完素对消渴(上消)、消中(中消)、消肾(下消)的理论认识和主要临证方药,是我国较早的消渴病专著,对现代临床仍有重要指导作用。

卷十四题为“治法心要”,又名“扁华生死诀”,体裁为歌诀,有《十八反歌》、《六陈歌》、《五不及歌》、《四因歌》、《运气歌》等。其来源或是在前人基础上摘录归纳,或是从当时医家或民间搜集改编,或是张子和或者其弟子们自创,大致撰成于《儒门事亲》编纂的后期。

卷十五题为“神效名方”,也称“世传神效名方”或“张氏经验方”。收录有张子和家传方、秘方、验方及其自创的专病专方共 273 首,是张子和临证经验的集成,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儒门事亲》全书,虽然汗、吐、下三法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绝不等于说张子和全部的学术是唯三法是用。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手法,攻邪派立论在“攻”,其说理方法自然要将“攻”摆在阳面,强调攻的作用,但它并无否定“补”的意思,而是把它放在阴面,以隐喻、托衬的手法表达出来的。何谓补?“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真补之义也”;“先论攻其邪气,邪去则元气自复也”;“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已交驰横骛而不可治也”;“陈莖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在这里,“攻中有补”、“补寓于攻”是显而易见



的。所以,读《儒门事亲》,关键在于明辨张子和“辨实于虚,识燥于寒”(《中国医籍考》)的用心,不能“不究其用意,议其治疾惟事攻击”(《医旨绪余》)。张子和并非不用补法,“凡病人虚劳,多日无力,别无热证,宜补之”,“夫病人多日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则愈矣”。有学者对《儒门事亲》中的处方进行了统计,发现在卷十二的171首处方中,具有进补功能的处方计51首,占内服处方总数的1/3,在卷十五的273首处方中,具有进补功能的处方计58首,占内服处方总数的1/3强(萧国钢.《儒门事亲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进补的方法,张子和认为“养生多论食补,治病多论药攻”,“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他还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搜集或创制了大量的食补处方,如以生藕汁治消渴,以粳米粥断痢,以冰蜜水止脏毒下血,以猪蹄汤通乳等。他反对过分依赖药物,认为“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他把因用药不当引起的疾病称为“药邪”,其对药源性疾病的论述早于现代认识几百年。此外,张子和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多科,所用方法包括内服、外用、针灸、导引、精神疗法、非药物疗法等多门,实际上所从事的是全科医生的工作,其学识之丰也从此可见一斑。

现代学者对《儒门事亲》的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余靖教授指出:“张子和一生勤于读经,精于研典,深得为医之道,潜心服务于民众。张子和治病主攻邪,世人称‘攻下派’。他认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其攻邪论依据源于《素问》,他善用汗、吐、下三法攻去病邪,并从六气分证,又倡‘三消当从火断’之说,在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扩充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三法的应用范围,对祖国医学治则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宏观上再现张子和学术的全貌,是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是传承和发展中医学的重要基础性工作(钱超尘等.《张子和研究集成·序》.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认为,张子和“既精通医学,也涉及道学,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是逆唐宋医家崇尚使用古方补药的遗风而上的,又自傲孤芳于世,因而其所论多补偏救弊之说,自然会褒扬者有之,贬谤者亦有之”。他“运用的汗、吐、下三法远远超出了《伤寒论》开创的三法范围,突破了六经辨证的常规用药规律”。张氏书中“记述了一些相关病案,说明张氏极有卓见,既继承前贤理论,又丰富自己内容”,“他收集的病案涉及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有急救、取咽中异物、心理疗法等等,可见张氏医学造诣之深、学识之广,又有创见,故能独树一帜,技盖群芳,超尘脱俗,自成一家”(邓铁涛等.《儒门事亲·导读》.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干祖望教授认为,张子和“创立新派,是中医的发挥弘扬,功不可灭”。“分析导致他成功的条件,有读书多而博,则见多识广,具备了最主要的创新立说的资本”。“今人向他学习,不仅仅是在‘攻’法上深入提高,而是在学术上的创新”(干祖望.张子和倡导汗吐下三法考释.中医药学刊,2002,20(2):177)。

河南中医学院李振华教授认为,张子和“纠补为攻,寓攻于补,精辟地分析疾病与正邪、攻法与补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是攻邪之法在理论上的很大发展”。“这种高超的学术见解,精湛的医疗技术,在当时业医者滥用温补成风的情况下,敢于坚持真理、纠偏创新,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同时于当今亦有现实意义”(钱超尘等.《张子和研究集成》.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三、《儒门事亲》的版本系统及整理思路

《儒门事亲》一书,以张子和学术思想为主线,其书其学,除张子和本人外,也与其友人、弟子们的努力密切相关。究竟多少人对此书的编纂有过贡献已无法确定,有史料可考的即有麻知几、常仲

明、栾企、赵君玉、阎瑀、李子范等人。他们或参与著作的整理、撰写,或参与文字的润色、修改,或发挥子和之学术,或奔走刊行之事务,其中贡献最大者为麻知几和常仲明,明·李濂在《医史》中“《儒门事亲》一书,是和子草创之,知几润色之,而仲明又摭其遗为《治法心要》”之言可证。麻知几,名九畴,易州(今河北易县)人,精诗文,好医术,与子和交往15年,是张子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术上的得力助手。常仲明,河北镇阳人,因治病而与张子和结识,对张氏医术佩服不已,遂执弟子礼,深得子和真传,成为其助手。

《儒门事亲》自刊行以后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分合流变过程而成今本十五卷的规模。《儒门事亲》作为书名,原本指其前三卷的三十篇论述,其他内容皆另有其名而与之并传。金元之间,《儒门事亲》已有多种版本,其中采用丛刻形式而以《儒门事亲》为总名者居多,如上述两种金刊本和元刊本之后两种,但虽为丛刻,而所收子目有所出入,因而卷数亦不同,各卷内容亦有穿插,但以《儒门事亲》(三卷)为首是一致的,这可能是虽为丛刻而终以“儒门事亲”为总名的原因。《儒门事亲》(三卷)单行本亦在此期问世,并且流传到了今天,即蒙古中统三年壬戌(公元1262)高鸣刻本。金元版本如金刊本,或流落海外,或不知所在,元刊本除高鸣所刊三卷本外,其他亦流散无存。《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儒门事亲》现存版本约有十余种,其中以“儒门事亲”之名单行者有蒙古刻本一种,明刻本四种,清刻本三种,另石印本一种,日本刻本三种,另影元抄本一种,收入丛书者有《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四库全书》本、《豫医双璧》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新中国成立后亦有多种排印本。上述版本中以蒙古中统三年壬戌(公元1262)高鸣刻本为最早,三卷;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公元1541)邵辅刻本次之,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吴勉学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又次之。

结合历代著录及现存诸本,《儒门事亲》的版本系统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 (一) 单行本系统

所谓单行本,是指《儒门事亲》三卷单行刊印的本子。在《儒门事亲》诸刊本中,蒙古中统三年壬戌(公元1262)高鸣刻本是现在所知唯一的三卷本。该本卷首有高鸣所作的序及金人张颐斋所作的引。据张颐斋所称“惜其真本为征君(指麻知几)藏于名山中,不可复见,今之板行者尚为错乱疑阙,殆传者之过也”,则该本可能更有依据在先。由于刊刻年代较早,国内藏本不多,惟北京大学图书馆与辽宁中医学院图书馆有藏。高鸣刻本还曾传到日本,日人伊泽兰轩称“今此三卷原本为元雕,而京师伊良子氏所储也”,日人丹波元胤称“西京伊良子氏藏元中统高鸣刻本《儒门事亲》,亦三卷”,日人据以进行了非止一次的影抄,即所谓“日本影元抄本”。“日本影元抄本”今国内仍有两处馆藏,分别在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至于“西京伊良子氏”所藏,则存佚未知。蒙古中统三年壬戌高鸣刻本与据此而出的“日本影元抄本”属于单行本系统,在《儒门事亲》的版本系统中具有独特地位。

#### (二) 丛刻本系统

所谓丛刻本,是指以“丛书”的形式刊行的张子和及常仲明等人的医书,而以“儒门事亲”为总名者。这种“丛书”又有单行本和丛书本两种情况。“单行本”是将之单独刊行者,如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公元1541)邵辅刻本;“丛书本”是指将之收入其他丛书者,如明·万历年王肯堂辑《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载各类医书凡44种,《儒门事亲》为其一。据《宋以前医籍考》、《中国医籍考》和马继兴先生的考证,丛刻本系统的《儒门事亲》又当有十二卷本、十五卷本、八卷本的不同,《心印绀珠经》所述的《儒门事亲》三十篇外加《治病百法》等五帙,亦属此系统。

##### 1. 十二卷本

清代黄丕烈在《莞圃藏书题识》记有“金刊本”《儒门事亲》,子目为《儒门事亲》三卷、《直言治



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疗》三卷、《撮要图》一卷、《三法六门方》一卷、《世传神效名方》一卷、《治法杂论》一卷,共十二卷。此本后藏于陆心源丽宋楼,今在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另,黄丕烈在《菑圃藏书题识》中述购得另一种“版刻亦出金源”的《儒门事亲》版本过程甚详,亦为十二卷,故此马继兴先生认为“金刊本”为两种,且均为十二卷,但其子目略有差异,如前者“十形三疗”为三卷,无“杂记九门”,而后者则将两者合为三卷,惟惜后者已不知所在。

## 2. 十五卷本

据《宋以前医籍考》引《经籍访古志》及冈西为人氏按语,有一种元刻的十五卷本《儒门事亲》。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马继兴先生比勘,此本与明·嘉靖间邵辅本内容全同,而邵辅本题以“重刊”,亦必有所依据,因而这种十五卷的元代刻本很有可能就是邵辅本的祖本,但今已湮没不闻了。将上述元代刻本、邵辅本与今传十五卷《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比照,前两者中“治法心要”与“扁鹊华佗察声色定死生诀要”各为一卷而成十五卷之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则将两者合为一卷,另入《三消论》一卷而成十五卷。因此,十五卷本当有元代刻本、明·嘉靖邵辅刻本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三种。清以后诸本皆从《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出,亦属十五卷本体系。

## 3. 八卷本

亦是元代刻本。《宋以前医籍考》引《滂喜斋藏书记》称:“元刻太医张子和先生《儒门事亲》三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疗》三卷,金·张从正撰。”今不传。

### (三)《医方类聚》征引

《医方类聚》系朝鲜金礼蒙辑中国医书而成的一部类书。在《医方类聚》中,“《儒门事亲》”只是前述三卷本的概念,《杂记九门》等是完全与之并列的独立著作。由于是类书,张子和诸书的内容在《医方类聚》中被分别归于相应类别之中,如《儒门事亲》卷一的“七方十剂绳墨订”等被收录在卷一,而卷二的“五虚五实攻补悬绝法”则被归入卷六,《三法六门》中风门的内容归入卷二十一,寒门被归入卷二十六。《医方类聚》刊行于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惟晚于蒙古中统三年高鸣刻本,较其他诸本皆为早出,为研究张子和诸书的著述及流传情况和校勘整理《儒门事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 (四)新中国成立后诸本

“新中国成立后诸本”并非一个系统,而是以十五(十四)卷本为基础,或标点排印,或详加校勘,或校勘注释,以直接服务于读者。依其所做工作,可分为排印本、校注本和点校本三种。上海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出版了《儒门事亲》的排印本。校注本主要有两种,一是1984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儒门事亲校注》,二是199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子和医集》。《子和医集》将原被收在《刘河间医学六书》中的《心镜别集》列于《儒门事亲》后,其书出常仲明之手。此二种校注本所据校本以十五卷本系统为主,兼采他书。1998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儒门事亲研究》中,以“《儒门事亲》新校”为下编,详于校勘而未做注释,因而是点校本。该本增加《医方类聚》为重要校勘依据,解决了一些在十五卷本系统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自明代以后,十五(十四)卷本《儒门事亲》广为流传,成为该书版本系统的主流,现存诸本多属此系统。三卷本《儒门事亲》自明以后不曾重刊,因而不仅世所罕觐,且因为前者的传布而失去了在《儒门事亲》传本中的主体地位。《医方类聚》虽然保存了《儒门事亲》早期传本的某些内容,但作为类书毕竟不能与原书传本等同视之,且所援引仅涉及《儒门事亲》、《治病百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治病杂论》、《三法六门》、《神效名方》等七种,也因此成为缺憾。另外,现存十五(十四)卷本《儒门事亲》中最早的邵辅本讹误较多,王肯堂将《儒门事亲》辑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所据即为邵辅本,除增入《三消论》外并未做太多工作,邵辅本的错误几乎被全

部沿袭。这种情况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才得到了一定的纠正,《四库全书》本的《儒门事亲》较之邵辅本和王肯堂《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讹误明显减少。嗣后民国间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对《儒门事亲》也做了一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经过相对精审的校核,对《儒门事亲》在当代的传布意义很大。

迄今可以见到的《儒门事亲》的各种版本大体在 30 种左右,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 1961 年和 1989 年两次编纂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内容,结合笔者近年来其他途径所得,这里按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于下,藉以展示张子和学术思想传承之大体脉络。

蒙古·中统三年壬戌(公元 1262)刻本;

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公元 1541)邵辅刻本(十四卷本);

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 1601)吴勉学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明·万历刻本;

明·五车楼刻本;

明·刻本;

日本·正德元年辛卯(公元 1711)渡边氏洛阳松下睡鹤堂刻本;

日本·浪华书肆刻本;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公元 1778)本(《四库全书》本);

清·咸丰六年丙辰(公元 1856)敦化堂刻本;

日本·文久元年辛酉(公元 1861)年江户学训堂仿朝鲜本(《医方类聚》本);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公元 1907)京师医局刻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清·宣统元年己酉(公元 1909)海丰吴氏梁园节署铅印本(《豫医双璧》本);

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上海千顷堂石印本,《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

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石印本;

清·刻本;

日本·刻本;

日本·影元抄本;

1935 年上海大东书局本(《中国医学大成》第 5 集·通治类);

1955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本,叶川、建一编校《金元四大家医学名著集成》;

1958 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十五卷本);

1959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十五卷本);

1962 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本《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1999 年重印);

1984 年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本,张海岑等校注《儒门事亲校注》;

1990 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本(《中国医学大成》本);

199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库全书》本);

1994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邓铁涛等主编《子和医集》;

1995 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本,《金元四大医学家名著集成》;

1997 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本,鲁兆麟主校《儒门事亲》;

1997 年华夏出版社本,刘更生等校注《儒门事亲》(《中医综合类名著集成》本);

1998 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本,萧国钢著《儒门事亲研究》;

2001 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本,杨建宇校注《儒门事亲校注》;



200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邓铁涛等整理《儒门事亲》。

此次校释整理依据的底本为明·嘉靖二十年辛丑(公元1541)邵辅刻本,以《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为主校本,以清千顷堂书局石印本(简称“千顷堂本”)、《中国医学大成》本和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为参校本,以《医方类聚》征引为旁校本,同时参考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三消论》等较好的通行本中的相关内容。

由于底本讹误较多,按照常规出校则太繁,因此不能不有所选择。凡确系讹脱衍倒者据校本以校之,或据文义以校之,原则上不出异文校记。所据校本皆同者,以主校本、参校本、旁校本及参校资料为序出校,不叠赘校本,以省篇幅。校记行文除参照常规标准外,多采用短句或词组提注,如:“囊痒而燥:‘燥’原作‘操’,据《医方类聚》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增加校记本身的可读性,读者不必对照原文即可确认该校记是必要的。

校记甚多,注释从简成为无奈的选择,只能择其要而为例。凡释词语,一般直释其文中之义,并且多数出具了训诂书证,个别出具了文献书证。少数无直接书证可参但可据上下文义确定其意义者,以“此谓”冠之于前。注释以语词为主,阐释医理非注释可以胜任,而语词当释而未释者尚多,俟他日补之。

全文改竖排为横排,凡有表示“右”位的标示字,均改为“上”;全书均采用现代简化字体。凡繁体字皆改为相应简化字,如“癰”改为“痈”。古体、异体、通借皆属繁体字范畴的文字现象,简化字文本不可能也不必要仍其旧貌。因此,凡原文中的古体字,原则上改为其今体字的简化字形,如“藏”改为“脏(臟)”。凡原文中的异体字,原则上改为其相应正体字的简化字形,如“鹹”改为“咸(鹹)”。凡原文中的通借字,属现代习用之字者予以保留,酌情出注说明,其余参照古体字或异体字酌予规范。

金元之际中医学学术流派百花争妍,各竞风流,极大地推动和影响了中医学学术发展的步伐,《儒门事亲》作为此期重要的学术著作,不仅引起了当时的重视甚至争论,而且影响绵延至今,在中医学学术进步与学术传承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这已为近千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儒门事亲》的学术价值,深入研究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对振兴中医事业、发展中医学学术、提高学术创新能力,都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借此机会,我们还呼吁加大对更多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力度,使之在发展中医学事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文中未加标注的引语,均选自《儒门事亲》的各种版本)

温长路 焦振廉

2006年10月